

学术专论

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x

赵世瑜

[摘要] 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看并不落后于江南，其聚落发展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它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它形成之后，并不一定在空间上独立于原有的村落，使我们可以 / 巨村为镇⁰ 概括其特点。在此过程中，当地人如何称呼本地、如何称呼本地人，而非仅仅根据外人或后人的判断，也是我们认识村、镇性质及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出于对村镇一体关系的认识，与其说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 / 市场共同体⁰，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 / 地缘共同体⁰。

[关键词] 明清 山西泽州 村镇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9) - 03- 0001- 18

Villager and Townspeople: Location and Identity in Zezhou, Shanxi in the Ming2Qing Periods

In many re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 in Zezhou, the south2eastern part of Shan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did not lag behind the Jiangnan area. There was a long history for township development, but the towns had ver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villages. After their formation, the towns could not necessarily be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original villages. It could be said that / large villages became towns⁰, and the formation of townships took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village and town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at the inhabitants would call the locality and who they referred to as local people, not merely what outsiders or later observers saw the townships. As for the integral relations of village and town, it can be generalized as a / territorial community⁰ with the she as its core rather than / marketing community⁰.

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历来是海内外史学界研究的热点。¹ 已有论者指出，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市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²，即使最近一些涉及市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也多将二者置于一种二分的格局中加以讨论，即便是从城乡 / 连续统一体⁰ (continuum) 的认识出发，也没有改变其城镇乃是乡村的 / 异化⁰ 的认识特征。³ 此外，由于市镇研究的热点地区在江南，因此往往延续以往 / 资本主义萌芽⁰ 讨论的路向，关注的是市镇在 / 近代转型⁰ 中的地位，相对忽略了在特定区域内与其前身的脉络联系。本文试图从市镇研究中较少论及的华北地

区入手，思考本地人的认同改变及其动因，并把市镇和乡村放在同一空间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

关于山西的历史研究，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也日益得到瞩目。⁴ 但对晋东南泽、潞地区历史的系统研究，目前只有杜正贞的专书。⁵ 在书中作者侧重讨论村社传统，虽然也涉及当地，特别是阳城、沁水的个别市镇，但毕竟没有以市镇为中心展开。同时，对明清华北市镇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说，都无法与对江南市镇的研究相比，而泽、潞地区毕竟在历史上是以商业活动而著称的，

[收稿日期] 2009- 0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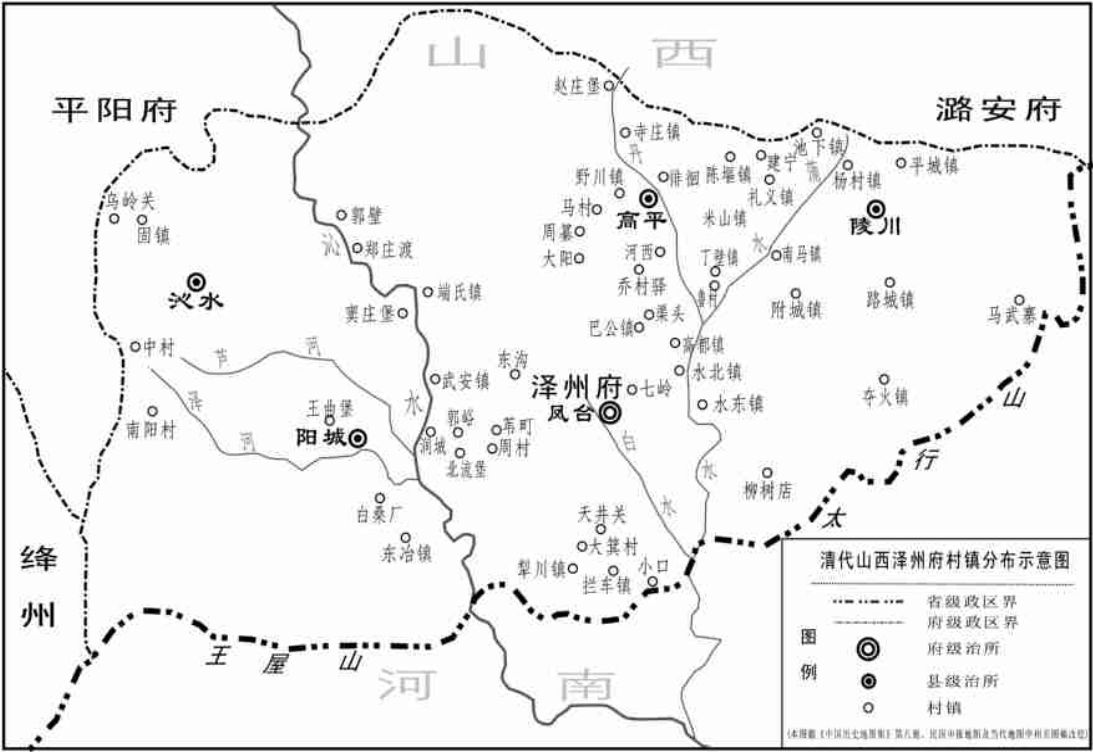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赵世瑜 (1959)，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因此本文对市镇的探讨自有其必要性，也可与上述村社历史研究相呼应。

一、泽州诸镇的历史沿革

明清泽州即今山西晋城地区，隔太行与河

南济源相望，古称上党。元、明时期泽州下辖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五县。清雍正后，泽州升格为府，晋城县改名凤台县。今晋城下辖晋城、阳城、沁水、陵川、高平五县市，几乎与以前没有变化，或许从这里也可看出此地传统的延续性。



泽州的内部环境，以府志引明代陆深的话来概括，即 / 太行山川有极佳者，大率万山中得一平旷有水处，便立州县。泽之郡县，皆在万山中，而川之大者，曰沁，曰丹，曰获泽，咸奔赴河、济为渠，为浸灌输民田⁰。这样一个山多田少、环境相对闭塞之地，不仅在明代产生了全国闻名的泽潞商人，而且遍布上古圣王女娲、炎帝、尧、舜、禹、汤等的 / 遗迹⁰和传说。虽论者颇以此类说法为虚妄，认为是后世的文化建构，但必有其原因值得追寻。

府志说， / 考浊漳以北，常山以东，又北逾雁代，皆其野。表里河山，藩屏中国⁰，⁶ 说的是就上古时期的华夏腹心地区，以这里为其限隔；而山东、河南之文化北上，这里同样是个界线¹。此后帝国的扩展、文化的辐射，也必越此地而向外延伸。就像黄河在晋南由南向而东折，在泽州与平阳（今运城地区）二府交界处进入河南一样，由关中腹心之地进入中

州，这里是重要的走廊。或者说，在较早的时期，泽州曾是 / 中国⁰ 的边塞；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是北方政权的势力南下的通道，这种地理的重要性不仅在周、秦、汉、唐时期可以体现出来，在金时期也可得到证明。今天晋城五县市下辖各镇，如同更上层的行政区划一样，多为历史的遗留，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中村镇的发展变化。

明清时期晋城（即凤台县）的镇况如何，没有十分完整的记录，只有根据零散的材料观其大概。清乾隆 5 凤台县志⁶ 记载境内设有仓廩的地方包括高都镇、头镇、苇町镇、周村镇、犁川镇、河底镇，虽没有大阳镇，却包括东大阳（即今大阳镇）和西大阳、巴公村、大箕村。¹ 其中苇町镇距离现在的川底乡很近，河底镇在今大阳镇与下村镇之间，头镇疑即为今渠头，距离巴公镇很近。在同书记载设有文庙的，则有巴公原、高都镇、大阳镇、周村

晋城五县市下辖各镇（不含乡）

地区	泽州	高平	阳城	沁水	陵川
现在的镇	大阳、下村、巴公、北义城、高都、北石店、周村、金村、大东沟、柳树口、南村、大箕、犁川、山河、晋庙铺	寺庄、马村、野川、河西、米山、三甲、神农、陈区、北诗	凤城、润城、北留、东冶、蟒河、芹池、河北、町店、次营、横河	龙港、中村、郑庄、端氏、嘉峰、郑村	杨村、礼义、附城、西河底、平城、崇文、潞城
清代的镇	巴公、渠头、七岭、大阳、东沟、苇町、周村、鲁村、高都、水东、水北、犁川、拦车（据光绪县志续地图）	寺庄、马村、野川、米山、河西、徘徊、建宁、周纂、陈（据同治及光绪县志）	在城、润城、白巷、郭峪、东冶（地方志缺载，据清代碑刻）	端氏、武安、郭壁、固镇、中村（据雍正府志）	杨村、崇兴、夺火、礼义、池下、附城、平城、潞城、南马、义和（据乾隆县志）

镇等。^ā

以今天泽州的镇和清末的镇相比，数量上后者比前者仅少两个，延续下来的有 6 个，但巴公、鲁村、高都、水东、水北等镇都在地理上非常接近的东北部地区，在空间上不太均衡。这种状况当然是与历史上这里是本地的中心，后来镇又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有关，而与后来镇成为一级行政中心，要考虑分布均衡不同，因此需要加以调整。

巴公、高都、大阳、周村等应为凤台或晋城县中历史比较悠久的镇。/ 金志：晋城镇二：周村、巴公。旧又置星轺，镇曰拦车，以北十五里有孔子回车庙⁰。^ᵛ所谓金志，不知何指，但拦车镇应为较古老的镇，何时始设，何时衰废，尚不得而知，今为拦车村，但与今天的晋庙铺镇距离极近。

高都是先秦时期便很知名的古城邑。/ 高都，邑东三十里高都村，，考 5 史记 6 秦庄襄王三年，蒙骜拔魏高都，似属魏。秦汉置县，在今高都村；北魏高都在今冶，不容混也⁰。^ᵛ也就是说，在后来的高都镇也即高都村的地方，曾经是秦汉时期的高都县。巴公镇的来历应该也比较古老，据说是 / 晋文公西伐巴蜀，迁巴子于高都⁰，所居之地被称为巴公原，后即巴公镇的所在地。而汉高祖封阳阿侯国，东汉设阳阿县，其地就在大阳镇。^k这些古镇之所以长期存在，与其早成较大聚落、甚至被设置为地方行政单位有密切关系。但它们显然也与处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有关，比如周村镇并没有古代城邑的渊源，但它正处在晋城与阳城

的交界处，也处在从晋南侯马一带向晋东南直至河南的必经之路上，因此也有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

高平的情况与前者有所不同。从镇的数量来看，清中叶、清末与今天基本相同；同时 9 个镇中有 6 个是一致的；^ᵝ另乾隆县志中记载，除米山、建宁、野川、马村、周纂、寺庄这 6 个以外，又有丁壁镇、唐安镇、换马镇，后来消失了或改换了名称，总数还是 9 个，^k因此更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但与凤台相似的情况是，由于这里为历代政权建设的核心地区，所以一些镇也具有比较古老的行政渊源。比如，唐高华府， / 县东建宁镇，唐高宗开府于此，开元初废⁰；^k / 周纂镇，故属晋城，宋之平泉故里也⁰；^l / 相传今邑米山镇为盖州，理或然也⁰，等等。^l

与这些镇的历史渊源有关，这些镇在历史上虽然不是最低一级的行政中心，但却有这样的中心的强烈色彩，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纯粹的工商业市镇略有不同。譬如高平的镇都建有堡：/ 邑堡则米山、建宁、玉井、丁壁、野川、马村、唐安、周纂、寺庄、赵庄、换马，凡十一，犹有宋时太行忠义砦遗意而险不逮矣。⁰作者认为， / 乡聚有堡，犹州郡有城，，然则欲弭流贼之乱，非并村置堡、得人以完守之，其能有济乎？⁰⁺可知在主要各镇都建有堡城，镇也成为军事防御的中心。

阳城、沁水、陵川的情况也大体类此。如沁水的镇数量不多，其中端氏镇处在往阳城、凤台的交通要道上，规模较大。镇西有所谓

／端氏聚0，曾是三家分晋之后将晋国国君迁往之处；镇东有所谓／端氏故城0，唐代曾把泽州的州治放在这里，到清代还留有当年的文庙和城隍庙；¹¹或说／端氏旧县即今端氏镇0。¹²这些镇虽然不复作为行政中心，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和地理位置的重要，它们还承担着许多政治、军事职能，这些也许是与南方某些地区的镇有所不同的。这种状况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没有历史传承的新起市镇不很发达，雍正府志中记载的沁水的镇，到光绪的县志中却少了很多，在后者的／村镇0部分中，明确开列的镇只有端氏、王寨和中村，其它分别记为郭壁村、武安村、固镇村，也许这些地方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至少在官方的眼里，重新从镇的位置回落到原来的村。同样的情况见于阳城的郭峪和白巷，到晚清以降，本地的碑刻里提到本地／镇0的情况也已大为减少了。

二、巨村为镇：地缘上的一致性

同治 5阳城县志6 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说明村与镇之间本来就没有很大的差别：

在城曰坊，在关曰厢，在乡之聚落曰村，附于村者曰庄。村之巨者，有商贾、集市曰镇。¹³

换句话说，这里的镇就是一个／巨村0，不同之处在于其商业集市的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县志并没有觉得镇比普通乡村更为重要而特殊，因此也就没有专门予以记载。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去了解一个作为镇的聚落的话，那就不得不从了解这个聚落作为村的情况开始。

高都镇在元、明之晋城县，清之风台县，今之泽州县境内。当地东岳庙现存两处金代石刻，一处正在殿左明柱上：

高都北上社维那赵铎自办家财，谨施岳庙正殿石柱一条。

妻司氏、弟赵钧、赵镐、赵锐、弟新妇焦氏、王氏、乔氏。

男成住、宜奇、侄男吴住、王住、念五、念六、侄女简奴。

时大金大定十八年岁次戊戌孟冬庚寅朔十八日丁未吉时立

石匠 司俊

另一处在正殿门楣上：

维南贍部州大金国河东南路泽州晋城县莒山乡高都管高都社众维那共发诚心，命匠创造神门一合，谨献上岳庙正殿，永远安置者。

进义校尉刘 、进义校尉张琪。

李昊、续厚、续美、元益、续林、续 t 、赵金、刘顺

王睿、陈仲、任德、司应、续 t 、赵铎、续 、任圣

时大定二十五年岁次乙巳壬子朔一日壬申立毕

石匠司俊 同男司宝

乡贡士段安 书

在金代，至少从上引碑刻中还未见有／镇0的概念。彼时这里是一种乡、管的体制，其中乡是比较虚的、形式化的，而管应是比较实体化的层级。按杜正贞的研究，这种乡、管的体制自五代时便已存在，宋开宝年间作为本朝制度实施，虽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废掉，但此后也未完全从地方的生活中消失。在本地府城村的玉皇庙中，金泰和七年的 5重修玉帝庙记6 碑阴题名也是／水东管西五都 司维那东元庆社进义校尉段继立石0，以下是府城社等各社管首、社人的题名。在／管0这种／地方层级0之下，水东是／都0；而在高都，管下直接是社，像碑文中题名所示，／南贍部州大金国河东南路泽州晋城县莒山乡高都管高都社0，或者如府城玉皇庙元至元三十一年 5玉皇行宫记6 碑文首句／大元国河东南路泽州晋城县移风乡水东管刘家庄0这样的用法，应是当时对各级管理组织的正式称呼。因此在县下村上，应该是乡）管）（都））社（村或庄）几级。

明代建立了里甲制度，它并非一个严格的地缘性制度，而是以户籍为基本单位的赋役征派制度，但大体会照顾到原有的聚落关系。清代府志记载里甲制度时说：／邑之有里甲，为编户之籍，亦古党载旅胥之师所，比伍闾联，相友相助之遗意。泽自前明寇残，户口匪昔，逃亡之屋，荆榛之墟，颇为司牧者所蒿目。0¹⁴虽然这只是非常含糊的概括性说法，但还是清

楚这个里甲也即明代那个 / 为编户之籍⁰ 的里甲，但同时也具有 / 相友相助之遗意⁰。

乾隆 5 凤台县志⁶ 记： / 县分四乡，乡分二十都，旧管分为一百七十一里，后并为一百五十一里。^{0m} 高都即为莒山乡义城都下的里，原有高都东里、高都中里和高都北里，后中里并入东里，冠以高都之名的应有两里。这套制度可以被视为明代插入地方的地缘系统中的具有特殊目的的制度，但它又给地方的地缘系统以深刻烙印。明代的高都东里、高都北里与金代石刻上的 / 高都社⁰ 和 / 高都北上社⁰ 也许不无渊源关系。民国二十三年 5 重修东岳庙记⁶ 题名有 / 高都三村士绅⁰ 的说法，说明这里应该是三个自然村，与明代的高都三个里可能也具有历史的传承关系。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这里的社应是村社，在明代以后设里的村那里才同时成为里社。

在高都镇东岳庙的明代碑刻中，社还以非地名的名目出现过。天顺五年的 5 重修殿宇记⁶ 中说： / 维那头晋志、李凯、李兴，，三人同心努力，t t 舍家财，礼请五社维那头人等，各输材木者，如云集而争先；并工陶冶者，若归市接踵⁰。这五社分别叫保福社、上社、下社、中社、南社，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说它们都是原来的高都社析分或演变来的。有无可能下社就是前面出现过的金代的高都北下社？中社即高都中里的社？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五社有可能就是高都下面的各个村社，而东岳庙就是统领各村社的高都镇的社庙或者镇庙。清嘉庆间有 5 请定各社该行花车故事碑记⁶：

本社修建 t 槐神庙以祀天齐仁圣大帝，历有年 t 。每岁三月二十八日，虔备油席、鼓吹、大戏、旗伞、花车、故事奉祀圣诞，t 村行会相沿已久。t t t t 前嘉庆十六年三月，逢闰值事公议重新整齐，会同客社以及诸行户将花车故事定一额数分派办 t ，协力共济，于 t 东社倡其首，众社 其成，焕然振兴，为镇之光，迄今约三岁矣。且会事既成，而碑石未立，犹有憾焉，兹于二月朔日，轮班会社，复议勒石题列，永垂于后。适值正会前七十日石一告竣，聊记始末，俾众人属

t 不 t 罪首事者之废缺云。

凤台县儒学生员原凤德撰书。

各社花车数额，，（此后字迹不清））引者）

嘉庆二十年三月十八日东山四社会首公勒。

这里的 / 本社⁰ 应指高都社，但 / 东山四社⁰ 何指并无更多材料可证。碑文中的 / t 东社⁰ 应为水东社，水东与高都距离很近，东西并立，都在府城之北，又都是镇的所在，可能是相互联合的一个跨越以往乡、都传统的社的联盟^m。这样，原来与高都社联系更为直接和单一的高都东岳庙，开始超越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与更大地域上的社群发生联系。这种变化，显然与镇的发展及其空间网络意义使其覆盖的空间超越了传统的行政组织或聚落层级有关， / 焕然振兴，为镇之光⁰ 几个字，或许可以成为以上说法的注脚。

冶底村同样在泽州县，只不过与高都恰恰形成一个对角，高都在府城东北，冶底在其西南。明永乐 5 创建东岳速报司神祠记⁶ 中说： / 泽州西南约一舍余地，所谓冶底里者，有庙在焉。^{0m} 万历四十三年 5 重修东岳天齐庙舞楼三门记⁶ 中记： / 我大明山西泽州治之西南三十里许，有镇曰冶底焉。乃山陕通衢，宦商交错，日无辙西。传有东岳天齐行宫，群山背绕，流水面前，规制隆竣，其中桧竹森列，金鲤跃渊。⁰

明清时该地为县西五门乡武城都下的冶底里，根据上面的碑文，这里在明代也是一个镇，但从上表看，到清代这里并无镇的记录，这样的情况还见于高平的石末、郭壁。从保留下来的正殿边檐柱头刻字来看，该殿创建于北宋元丰三年，时称 / 五岳殿⁰。该殿门楣下还有金大定时期的刻字，说明彼时亦有重修或补建。这里保留下来最早的元至元年间的碑刻 5 重修岱岳庙记⁶ 中提到：

社西有祠曰岳 t ，已积年矣。偶 t 兵厄之后，伤哉梁栋之倾缺，瓦毁垣外，榛内棘须，风雨剥丹青之像，奈春秋失香火之仪，瞻之者无不悼哉。此本社乡老董仔暨社长门聚，与德年丘坚同老人门广，共启虔意，各分一隅，顷心协力相助者一十

三人，定立分数，出纳己财，营求瓦木等物，率诸匠伦鳩，其功半载乃毕，方之旧宇三倍峥嵘，尤增壮丽。

碑文中的 / 社西⁰ 其实就是指村西，与今天我们见到庙在村西北的位置一致。这个社既不是指社庙，也不是指组织。元代至元初年已在乡村的基层正式推行社制，/ 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各为一社者听，或三四村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0m} 文中提到的本社乡老、社长等等，都是这样一种最基层的地域性层级的负责人。我猜测，元代华北的社作为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村落的行政管理层级，是接续了，至少是利用了金代乡（管）社这种层级体系的传统。

正如杜正贞所论，明代的里甲制度对金元以来的社制形成了冲击。在明永乐 5 创建东岳速报司神祠记⁶ 的题名中，除了当地大小官吏的题名外，接下来是 / 本里里众耆民人、口匠安远坊杨拳、画匠安远坊王绘同弟王纯、石匠沁水县土沃里葛整⁰，没有出现 / 社⁰ 的痕迹。当然这并不能说 / 社⁰ 就此绝迹，实际上 / 社⁰ 在明清时期还依然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但重要的是 / 里⁰（以及城内的 / 坊⁰）变得重要起来。

在冶底村东岳庙正德年间的碑记中，题名是 / 白俊艮三钱，本里木匠白孜艮七钱⁰，里已成为表明所在地的单位，但文中还是出现了 / 今有本镇董文怀，，先克己资，后会本社，捧白银百两⁰ 的字句，^m 说明社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用 / 社⁰ 来表达行政序列中的一级。清顺治十八年碑文题名中也开列了董高惠等 20 余名社首。^m 乾隆间的一块碑刻上说，/ 冶 之有东岳庙，由来久矣。旧与环秀、犁川、常村诸社轮流周转，每年取水于王屋山之圣王坪，名曰倒水⁰。ⁿ 在清代中叶地方志的记载中，它们是本乡还秀都的还秀里、武城都的犁川里和常村里，在光绪的 5 凤台县续志⁶ 卷二中，还分别记载了这些里之下辖多少村庄。有意思的是，在前述元代碑刻的题名中，还保留了 / 常村崔 t ⁰、 / 元系众 t [环] 秀社人

氏⁰ 等字样，说明常村、环秀等社的体制一直从元代延续到清，与明代以后的里甲也存在一定联系。这种联系大体保持在一个地缘的一致性上，而把户籍与赋役的职能交给了非地缘性的里甲。

高平的米山可以说是个古镇。金人在当地定林寺的碑文中说：/ 此招提者，赐名定林禅寺，创建年远，不知源流，，有米山镇郭考宁，遵师道业，以将本家自造圣像并家资地土，尽系舍于寺内，永为常住。⁰ⁿ 可知金代米山即为镇。到了明代，米山镇显然有所发展：ⁿ / 高平县之东南十里许，有镇曰米山，民居稠密，犹一邑。然当泽、潞之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往来懋易，不远数百里。境内之地，此其最者。第无垣墉之蔽，米没患于盗，而有司莫之省者有年矣⁰。地方士绅便向新任知县建议修筑镇墙，于正德三年开工兴建，于是这一举措被人视为 / 不止于安一邑，而卫一镇也⁰。ⁿ 城墙的修建强化了米山镇的独特性，将其与其它村落区分开来，但这也并不能构成镇与村的重要差别，因为也有的大村为防备盗贼而修建墙垣。与此类似的是高平的建宁镇，现存明万历二十七年的 / 建宁镇⁰ 石匾也应是镶嵌于墙垣之上的，但现在基本就是一个乡村聚落的形态。

高平的石末现今为乡，在地方志的记载中从未被称为镇。但在当地的碑刻中，却被以镇称之：/ 石末镇为高平东南之望，而紫峰山又石末东南之望也。⁰ⁿ 明万历间知县曾撰写 5 石末镇乡约碑记⁶，说明石末至少在明清之际是被人称为镇的。但这个 / 镇⁰ 应该即指各乡村的集合：/ 约众俱兴木铎，一人持牌，二人振铎，遍村倡和圣教以警众。⁰ⁿ 在同庙及同村的元代碑刻中，未见镇的提法；而在民国时期的碑刻中，也都自称石末村。这种状况使我们怀疑，对于某些 / 镇⁰ 的称呼并不是十分固定的，作为明清一个里的首村，比较繁荣的时候或可称镇，实与村无异；到比较衰落的时期就少有人称其为镇了。

这种情况在阳城郭峪的材料里可以得到证明。郭峪在地方志里未记为镇，现在则是北留镇下的一个村，但它在明代就被人称作镇了。按清康熙时的碑刻，/ 按县东乡镇名郭峪者，

盖因里成镇，镇以里名也⁰。郭峪村因为是明代郭峪里的所在，因此便逐渐成镇，这与润城的情况一样的。这个地方至迟在唐便已成聚落，但在后周的碑刻中尚未称镇。在明嘉靖时的墓志中，我们见到 / 夫郭谷为阳之巨镇，繁琐之区，俗皆华靡相炫⁰ 的说法；ⁿ 万历时的碑刻也称： / 郭谷镇之西南隅，地势峻而风脉甚劲。⁰ 但这里称镇是否明初甚至以前的事，并不能确定。 / 吾乡自宋元以来，达显无闻；起明成化以迄于今，人文累累，甲第连连⁰，ⁿ 应该是成镇的一个基本氛围。清顺治十二年规定商税分摊的原则时这样表述： / 顺治十二年四镇分认，在城分税银陆拾两，润城分税银壹百壹拾两，白巷分税银贰拾两，章训都郭峪镇分税银肆拾两。⁰ 这后三个地方都是清代阳城 70 个里中的三个里，按这个说法，也许是当时阳城仅有的四个镇（一城三镇），至少是四个最大的或商业最发达的镇。

沁水的郭壁现亦为村。在被当地称为 / 大庙⁰ 的崔府君庙，有明万历四年阙名残碑记： / ，，东百里，居民数百家，镇之南旧有神祠一所，创于宋，重修于金元，，⁰ 说明明代这里已成为镇，直到雍正府志中还记载这里为镇。在题名中，有 / 进士邑人韩可久撰，进士邑人韩子义篆，进士镇人苏守志书⁰ 的字句，ⁿ 清晰地区分出 / 邑人⁰ 和 / 镇人⁰ 的不同， / 镇人⁰ 的身份得到了强调。直到清道光时的碑记中，还称为 / 吾镇大庙⁰。ⁿ 根据庙中所存明清碑刻记载，历次修葺基本都是由本地姓韩的大族主持参与，另外还有姓苏的人始终参与，历经近三百年而主事者变化不大，说明这个镇与村的特征类似，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聚落。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碑上的 / 邑人⁰ 韩氏，到清道光时则为 / 邑庠生镇人韩增寿（德征）撰并书⁰。

明代泽州县的周村镇是个历史悠久的大镇，那里的有关记载则充满了对本镇及镇人身份的自豪：

泽据太行之险，扼燕云，俯瞰中原。镇居郡西，黄沙耸峙，太行、王屋、析城诸山献嶂列峙，乃巨镇也。⁵ 金史⁶ 曰：晋城有周村镇。以镇表识，泽雄三晋而镇实一郡冠，，暨石勒、慕容永僭据，金粘

没喝位闰，于宋岳武穆义旗北指，镇之梁兴筑岩响应，，人文熙洽，科第相望，语泽士之杰且多者，以镇为最焉，，镇故有庙，正殿祀东岳神，，镇人张仲让、司蛟等倡众以新，，ⁿ

这里至少在宋代就已成镇，这个东岳庙也曾北宋元丰时重修，这样历史悠久的镇长期属于晋城，没有发生行政隶属的频繁改变，在明代还出现过吏部员外郎卫邦、阜平知县梁恺、神木知县李荣、涿州知州范祺、临潼知县梁悌等官绅名人，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地域认同。

本节之初谈及 / 巨村为镇⁰，倒不是泽州地区独有的状况。在晋中地区的太谷，阳邑镇 / 为太谷四镇之一，村大户繁，分六社，社中多好善之人，村中多修善之事。于是 t 六社公所而立大社，每于一、五日，六社社首集议于斯，小则排难解纷，大则修桥建庙，捐谷储仓，兴一切施济益人之事，或由是出焉。⁹ 该镇显然也是个 / 巨村⁰，此村原分为六社，为了协调六社，又于其上成立大社，唐开元间建造的净信寺即为此大社社庙， / 村人皆呼之曰公厅⁰，这个 / 大社⁰ 就成为镇或巨村的公所。

在明万历碑刻的碑阴题名中，出现了东社、中寨、中社、寺前社、后社、前社这六社名称，应该表示的是不同方位的聚落；在崇祯二年碑刻的碑阴题名中，则是前、中、后、东、南、西南六社，与前者名称有所变化；在康熙二十六年前后的碑阴题名中，有寺前、南、后、中、东五社出现。到乾隆十二年碑刻中，称 / 又于本镇六社共化银约百余金⁰，碑阴题名 / 本镇六社地亩⁰ 中出钱的，分别是东、前、后、寺前、南、中六社。由此可知，虽然历代名称略有差异，但大体相同，应该是阳邑镇的基本村社组织。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名称中的差异是替代的结果，因为明崇祯时的西南社到清乾隆时还在单独修建那里的观音堂，只不过从阳邑六社的系统中被清除出去了而已。从题名看，西南社众基本姓杨，而与从明至清一直把持净信寺六社主导权的杜氏不同。

阳邑六社与周边村落、里甲到底是何关系？从地缘上看， / 余乡东南两麓有泉，四卦、李满庄并余乡三村镇，世传为谷德将军韩厥出

马，，0，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邻近的、具有共同传说系统的地域。在清代，阳邑之义仓设于净信寺，/系回马里、四卦里、阳邑镇三里公立0，/三里所贮仓谷，日后开放补纳，三里户头、社首递年按粮经理摊派，各管所属里甲村庄不得推诿0，也说明了这三个形成地理三角关系的/里0或村之间的共同地缘联系。但在乾隆5太谷县志6中，清代阳邑并不是里，也许是延续了旧有的称呼，但这里却似乎提到了社与里甲、村庄的关系。⁹虽然没有具体的记载，我依然怀疑阳邑内部的这些社与较早的不同聚落的渊源，阳邑后来逐渐并成一个巨村，这些聚落也从地理上和组织上逐渐划一，在六社之上建立大社就是其表现。

三、称镇与村镇关系

上文中的高都和冶底虽然不是县城或府城，但也都地处本地的市场网络中心。万历5创修拜殿山门记6说：/尝闻高都乃古郡也，在州治之东三十余里，拥太行之盛，壮晋阳之雄。镇东北祀有东岳天齐仁圣帝行祠，传来旧矣。0冶底虽然现在是个大村，但明万历四十三年5重修东岳天齐庙舞楼三门记6中也记：/我大明山西泽州治之西南三十里许，有镇曰冶底焉。乃山陕通衢，宦商交错，日无辙西。0

虽然存在米山、周村这样自宋、金时代就称镇的地方，但多数镇应兴起于明。在碑文中，高都和冶底作为镇都是在明万历时才首次出现，这应该与明代以及泽潞商人的发达有关。镇的兴起既会改变原有的聚落关系和居住状况，也会改变居民与当地主要祭祀中心的关系。或者说，在原来的村落土地上生长出的镇，会异化于这些村社，还是继续依赖这些村落？镇与村社的关系如何？⁹

在上文提到的各个镇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类型。

在高都东岳庙较早的碑刻中，我们看不到能够回答此问题的材料。清嘉庆十五年5东岳驾前制提炉风扇碑记6中有了这样的说法：/吾镇东庙古祀天齐大帝，每年三月念八日恭奉圣诞之辰，合镇赛社迎神，游巡一方。0在这里，/镇0成为一个统领附近一带地区的概

念，不再是以村，而是以镇的名义来统领各社的迎神活动。高都东岳庙是否从高都社的社庙变成了高都镇名义下的更大范围的公共资源？也许，前述嘉庆二十年碑文涉及的范围更大的所谓东山四社，就是这样一场变动的产物。我们或许也可以由此理解，本来只是作为一个/巨村0而称镇的聚落怎样到民国以后变成一个村以上的行政层级。

根据光绪5凤台县续志6提供的地图，在清代中晚期，本县东北部地区只有三个镇，一个是最东北角上与高平毗邻的鲁村镇，一个是本地区比较靠中心位置的高都镇，第三个就是靠西南也即靠近县城的水东镇。如前述，水东镇的前身是宋、金、元的水东管，但其/管庙0玉皇庙却在相距较远的府城村。虽然元、明时期，水东社一直是玉皇庙/七社十八村0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使成为镇以后，它始终也是明清另一个/里0下一个村庙活动的参与者（水东在明清为移风乡建福都的水东里，府城村为同乡丰安都的府城里），不知道这是否是其发起所谓东山四社活动、与相距较近的高都镇合作的原因？

民国时期的碑刻果然更加凸显市镇的重要性。民国二十三年的5重修东岳庙记6中说：

东岳为五岳之一，载在祀典，岁有常祭，其崇而奉之也固宜然。礼有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封内山川。高都居晋城东北，不过一巨镇，而竞修庙致祭，拟与王者，无乃僭与？非也，，高都之庙，士人号为天齐，以其功德隆盛于天齐等，故谓之天齐。相传神以暮春降诞，适符春生之会，至日远近士女盛设香火，陈百戏以赛祝，典至隆也，，民国壬戌，众首事意欲振新，恐志未逮。又邀请本镇绅耆，建议捐修，一倡百和，集腋成裘，不数月间而颓宫败宇焕然改观矣。

碑记作者的意思是，若按照礼制，尽管高都是个镇，建东岳庙也是一种僭越的行为，当然由于碑文下面所说的原因而不能这样认为，等等。这表明，作者已经是把东岳庙视为镇之所有了，却未想到没有这个市镇的时候又该对此庙如何视之。这次重修也是与/本镇绅耆0商议操作，当然这些/本镇绅耆0可能也是现在

居住在镇中的原来的村社成员而已。

同高都类似，高平的米山既是一个古镇，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的镇，这里的镇与其它聚落有着相对清楚的区分，自身也有比较清晰的认同。前述这里的定林寺在大粮山上，而该山被视为本镇的风水所在，所谓 / 大粮，米镇主也⁰。^b 由于明末清初在这里开设煤窑，导致镇人的不满，曾迫使县里禁止在此开设煤窑：/ 照得大粮山为米山镇来龙去脉，阖镇生齿所系，千家坟墓攸关，亘古以来，从不行窑取煤之事。因被奸民张国龙、张德威凿山开窑，有伤龙脉。⁰ 这里大粮山作为一种象征已被 / 镇人⁰ 所垄断，而这似乎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这一禁地的区域是：/ 东至王家庄土桥河外，西至南庄石桥口，南至本镇南河，北至七佛顶。⁰^d 这基本上是清代米山北里略大的范围，也可以被视为米山镇的空间范围，周边的许多村落都不在其内。明正统碑刻记：/ 兹有本镇男善人陈怀美发一良心尊佛像，全管妆塑，微有西尊。本寺惠海同赵庄主程聚、川底乔奎、米山赵凤等众，具以周隆。⁰ 题名中也有 / 本镇作纠耆老⁰ 某某，^e 说明这个 / 镇⁰ 与同属一都或一里的其它村庄存在界限。

虽然定林寺并非米山镇的社庙，但从金代开始，维护该寺已成为本镇人的专职，这也是镇人塑造认同象征的表现。除前述金人郭考宁、明人陈怀美外，许多碑刻都记述了这样的举动。如明万历时 / 镇民王孟林、孟连登、王东鲁等，有忧之虔心，同许每岁供水陆一堂⁰；^f 清乾隆时，/ 本镇赵子讳云程，，后与本镇同志八人，，即将社内余金，觅工栽树⁰^g 等。但与高都不同的是，在晚清时期定林寺的碑刻中，提到镇民的地方几等于无。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材料，都没有显示出这些镇与本村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差别，也没有显示出相对于原有村社的变质。但是阳城县润城的东岳庙却透露出一些更复杂的信息。

润城在明清为阳城东乡之润城里，但据同治县志，里之上还有都，润城里即属润城都。/ 各都之首里与都共名，各都之里唯上庄有里无村⁰。^h 润城正是这样一个都的首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市镇的一个 / 巨⁰ 村，而且即使在成镇之后，也会被本地人习惯性地仍视为

村。^h

关于这座东岳庙的历史，明万历年间的 5 重修东岳庙记⁶ 称 / 镇中古有东岳庙三进⁰，实属语焉不详。清乾隆 5 润城社新制神衿仪仗记⁶ 更称 / 乡之社，盖莫详其所自始⁰。今人考始建于金，但目前不见相关记载。在前碑中，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明代中叶前是并不发达的，没有出过仕宦之家，是否已形成集镇也未可知：

润城镇古名小城，脉势围固，水绕山环，人聚风秀，今古无宦。自嘉靖三十八年蒙县主张爷，陕西西宁人，进士出身，嫌村名不好，祈吕仙鸾笔，改为润城。至改后，民淳繁富，人物端清。

这说明此地原名小城村，嘉靖三十八年改为润城村，这以后才变得富庶繁华起来。大约经历了 30 多年后，到万历中叶，这里已经成镇，具有了大兴土木的条件。

万历二十年，蒙县主叶爷，山东德州人，进士出身，亲诣乡约，见殿榻毁，张诏等禀建，慨得金语重修。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祭设，请村百众，共议为首四十余人，凡布施各坊社首，犹秦轍舌化善缘成功，有催有纳，有收有支，销洗心言，誓不得一人由己。寄居善人张世德，施银百金，感镇民诚心竭力，本村随社一千五百家余，喜舍资帛木石等项，家家争先迎送布施，户户夺前造管肉饭。

这段文字涉及了村与镇的关系，但却语焉不详。文中提到 / 镇民⁰，也提到 / 本村⁰，我们很难分辨这是作者有意的区分还是习惯性的混用。从上下文看，当原来的村成镇之后，其中的中心地区仿照县城的设置划分为 12 个 / 坊⁰，因此虽然 / 镇人⁰ 可以仍被广义地称为 / 村人⁰，但也可以被狭义地理解为十二坊的居民。或者说，当坊被区划出来之后，同村为镇的居民可能因此有了一个区分，即十二坊居民更具有被称为 / 镇民⁰ 的资格。根据碑文，是在一百个 / 村民⁰ 当中选出 40 多个社首来操持修庙之事，碑后开列的 42 名社首应该就是碑文中说的 / 为首四十余人⁰，其中就包括镇中十二坊的社首 27 人。一方面，/ 各坊社首⁰ 所代表的 / 镇人⁰ 主要扮演的是 / 布施⁰ 的角

色。因此才有 / 感镇民诚心竭力，本村随社一千五百家余，喜舍资帛木石等项0 的说法。揣摩这句话的语气，虽然镇与村本处同一空间，但 / 镇人0 多是外人，而 / 本村0 才是本地人))) 外人都很热心，本村人怎敢不尽力而为？这样才与上一句 / 寄居善人张世德，施银百金0 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9

在碑文的题名中，十二坊社首的头衔是 / 贤能勤劳督运社首0，与后面的 / 贮守布施社首0、/ 计算支销社首0、/ 督功社首0、/ 总化缘监视社首0 等相比，基本上是个荣誉称号，而后面的则体现为具体的工作。虽然十二坊社首列名居多，但估计是因为有许多捐款者是外来者的原因，所以本地人要求他们长期性投资，以换取本地的身份认同，否则碑文中的下列文字便有些奇怪：

他乡奸黎鞭惩国税而不纳，我镇良民善感神社而肯施，，虽名重修，功大即系创建，先将为首勒入卧石。为庙前后俱坏，建一殿而新，不如不建。力出于众，大幸岁丰，产营活便者，志限三年内，一进准要完新。志再限十年，内外一通俱要建新。恐为首限内命终之人，名下刻石，伊子随之。伙中定有高明远见、才力精通，若见在不同心、不竭力、不谦为者，共誓盟曰：故懈怠怠，犹活桩死，神照不久亡矣，，安已立卧石，拴首远虑，修功勿得滞之。本村善施者，功殿未完，难入卧石，待功完，照布施次序，另有大石刻细云，名留千载不朽。本镇有好事贤能为建者，首名入石，藉众圣事，非予等强为之也。

所以，尽管张世德捐银一百两，也没有被刻名于碑。其原因在于，此时庙还没有修完，修者计划三年修完一进，十年全部完工；若未完工前本人死了，子孙继续承担义务，直到完工之日才勒石刻名。同时声明，这是为做善事，/ 本镇有好事贤能为建者0，可不是我们强迫的。这些似乎说明，作为本地人的村人与有相当部分外地人的镇人之间，此时开始有了一定的分别。可以明确的是，这个润城社的构成，在明万历时期，并不是完全由 / 镇民0 或镇上十二坊社首控制的。

这种情况的改变到明末清初就有了痕迹。崇祯八年的 5 乙亥宰社碑记6 记载了一个姓乔的人于本年接任润城社社首的事情，虽然碑文中谈到战乱之后 / 大村巨落，荡为灰烬，本镇尤甚惨焉。毋论蓄以宁室，家百不一，有即储以供神祀不问，然无遗矣0，但在尽力重修东岳庙事上，十二坊的社首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题名中以他们为主。到顺治五年的 5 戊子宰社碑记6 中，谈到战乱破坏的情况较少，题名除了捐款者姓名者外，就是总理社首翟凉和十二坊的各两位社首，尽管看不太出这其中包含多少外地的移民，但至少看不出以往的十二坊以外的村民参与或主持的情形。

到乾隆时期，经济比较繁荣，所谓 / 润城之在阳邑，巨镇也。比屋鳞次，烟火数千家0，具有了维护社庙的条件：

乾隆三十有六年春，社首魏君世梁、张君世禄、成君文宠等，毅然更新。乃谋诸镇人士张君受祉、延君镜心、王君萌生等，相与哀金庀工，授之式法，协诸仪则。工既讫功，遂陈列而观之。社鼓逢 t，钲声盈耳，华盖旋转，旌旆飞扬，其繁庶之容，丰盈之象，以视曩日盖无以加焉。是役也，凡为金二百有奇，皆取诸镇人之乐输者，不数月而告成。9

由此可以看出，到此时社首商量的对象、募捐的对象都变成了 / 镇人0。必须指出，即使是称为镇人，也不等于他们就都不是原来的村民或本地的土著，像碑文中的延氏，从明代就是本地居民和十二坊中的大族。只是作为一个地名，润城镇变得比润城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镇民成为润城社的领袖，东岳庙由此变成了这个 / 镇0 的社庙。在这个意义上，此时的社庙便渐与以前的乡里之制渐行渐远。但是，由于镇由此开始了它将作为一个基层行政层级的历程，社庙的地位似乎却依然未变。

附带说，在润城，明末崇祯年间也修建了防卫性的砥泊城，后因士绅居住和独立经营而与润城镇十二坊之间形成特殊关系，已如杜正贞所述。但因砥泊城与润城镇同为以前的润城村，前者乃是后者的空间上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士绅同为润城社的成员。砥泊城只不过类似于郭峪城，因此尽管那里居住着士绅，还是润

城村人，镇的出现并不能完全改变社人的身份，而这一身份又是以村人的身份为基础的。

四、里人与镇人：郭峪的个案

虽然在上节中已经涉及村人与镇人的关系问题，但由于阳城郭峪的材料比较丰富，可以使我们把它们单独进行讨论。与润城不同，那里也许是因为地处要道，成镇之后一直延续至今，郭峪虽然曾经历过繁盛，但最后仍回落为村。正如阳城另外一个村下交，虽一直为村，但也有称 / 其村曰下交，人烟稠密，为邑南重镇⁰ 的，⁰ 可知在泽州的许多地方， / 镇⁰ 的含义就是一个中心聚落。

杜正贞注意到，在明清时期，郭峪出现了 / 镇人⁰ 与 / 里人⁰ 之间的紧张关系。她认为，所谓 / 里人⁰，就是被政府编入户籍的郭峪里人，一般是有田产的本地人；而所谓 / 镇人⁰，一般是指并非编户的、外来的工商业从业者。揭示这种紧张关系的，是清康熙时的一块碑记：

按县东乡镇名郭峪者，盖因里成镇，镇以里名也。镇成，而凡所托处者率致富厚，里人实贫，四散他所。人见城垣完固，栋宇壮丽，辄谓富饶甲诸镇，以空名而受实害。不知镇非穷镇，里实穷里。今且镇虽不穷于皮而穷于腹里，里人更甚。私计不难办，茕茕里甲，非死即徙，势且同归于尽也。惟县主都老爷洞见疾苦，有可以利吾里人者，靡不欲拯溺救焚而急焉为之所。于是本里绅衿里甲，仰体斯惠，相本里之美利可因者，莫如斗行一事，急行呈请，即蒙锐意举行。方及三月，而鼎镬之徒，复欲狡谋由旧，以撼成议于仍。持正论而卒不以私废公，此仁慈出于明断，岂止一时之里甲蒙恩，且令宛从者^t 而生，为朝廷留亿万载供赋之地，其所开岂^t 鲜哉！夫铭以口何如镌诸石，行使百之下者昨弊蒂而心铭之，并以俟后之来继，我^t 后者以为加^t 与除之，勒于石，为记。

阳城县正堂都为晓谕事：据郭谷里绅衿里甲呈状，为本里白米、杂粮斗行积弊

相沿，久被强占，卖贩居民，两受其困。且本里里甲之苦，受多烦多，残不堪命。公谕将本里白米、杂粮斗行统归见年里长轮应，以苏里役之苦。花户之帮贴永行禁绝。本县阅其呈状条陈，苏里甲以办钱粮，在官在民，殊为两便，相状如议准行。但恐既应之后，复踵前辙，^t 民交病，有使司市之宜，又恐不法之徒，挟私隐恨，妄生事端，仍行肆害，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即郭谷镇居民人等知悉，嗣后一应柴余杂粮，因时定价，交易两平。斗严抄勺，无容高下其手；戡析分毫，不得轻重其权。勿多增价值，而病在土著之民；勿巧取牙用，而病在负贩之子。至^t 旧牙豪棍，亦不得借端生事，阻挠官行。如有前项等弊，许该年乡地里甲即行赴里，以凭尽法究处施行，决不姑贷。^p

碑文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后面的官府告示实为附录，讲到一个具体的案例，而前段则为借题发挥的感慨，涉及到 / 镇⁰（非 / 镇人⁰）与 / 里人⁰ 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从后面的案例来看，问题的核心是斗行也即粮食收购商。从材料的含糊语句中揣测，似乎斗行当时是被外地来的粮商把持着，而且根据下文似乎是由他们代行征收（或包买）田赋，^p 也由他们买卖粮食，所以本地的 / 卖贩居民，两受其困⁰，即粮贩和居民都受到损害。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粮商牟利，有些额外的需求或损耗还需要 / 花户之帮贴⁰，因此本里的绅衿主张斗行应由值年的里长来轮流兼任。换句话说，本来由里甲承担的征收钱粮的职责，到明清之际为包买商代行，而花户只需 / 帮贴⁰ 一些钱给粮商^p，作为其包税的报酬。另一方面，斗（粮）行收购了粮食之后，又在市场上扮演向居民卖粮的角色。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趋向于市场化的赋税交纳，官府发现即使改为里长负责也不一定能杜绝这个问题，因此需要的是公平交易。这样，既要求斗行不要抬高收购价来伤害土著（里人），也要求牙行不要多收额外的费用，来损害粮商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会由此引发 / 里人⁰ 或里中士绅对 / 镇富里贫⁰ 的感慨呢？郭峪里是明代阳城的 99 里和清代的 78 里之一，不过在康熙

二十六年前，全县因人口减少而缩编为 40 里，但郭峪里均在其内。但该里下包括哪些村庄，未见地方志记载。如果按照碑文中 / 因里成镇，镇以里名 0 的说法，这个 / 里 0 即可能指包含数村的里甲之里，也可能仅指里的首村即郭峪村。陈廷敬曾说：/ 吾所居镇曰郭峪者，连四五村，居人逾千家，皆在回峰断岭、长溪荒谷之间。0⁹ 这其中包括郭峪村，也包括陈氏所居之中道庄，另有三、四个小村庄，当然郭峪村应是郭峪镇的中心，甚至在狭义上就等同于郭峪镇。

明崇祯五年陕西农民军一度攻入郭峪，造成当地的动荡，于是崇祯七年以郭峪村人为主，为其加筑城墙，成为郭峪村凸显其 / 镇 0 的身份的重要标志。其中主要出面的士绅张鹏云是郭峪村人，而具体实施者大商人王重新也是郭峪村人。据称其 / 周围合计四百二十丈 0，即平均每边 300) 400 米，应该只是把郭峪村包含在内。⁹ 又有碑文说 / 阳城县之郭谷镇，建城一座 0，⁹ 说明这个镇的范围就是郭峪村，而不包括郭峪全里的村落。因此其出力的主要是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属于黄城村（中道庄）的陈家的陈昌言只是众多赞助者之一。郭峪建城之后，才进一步对内部聚落重新进行了规划，建了三层共 609 眼窑洞，供城中居民租住。其四至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张府，也包括了王家，⁹ 说明这两个郭峪村的大户，自动成为 / 镇人 0。清乾隆时又在城上加修了奎星阁，⁹ 咸丰时还在继续维修护城河的堤坝，⁹ 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镇的独特性。

陈廷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住在郭峪镇。/ 樊川在阳城万山溪谷之间，余家焉。其南半里许，墟烟相接，林木交映，邑之所谓郭峪镇也 0。⁴ 王重新在记述崇祯五年战乱情景时谈到郭峪村受到的侵害，全县中 / 独周村保全一城，上佛保全一寨，吾乡保全陈宅一楼，余皆破损 0，⁹ 也是把陈家所在视为本里的另一村。在本地所存墓志中，明代墓志多按籍贯称墓主为阳城郭峪里人，并不强调具体的村或镇，因为里是籍之所在。但陈氏家族的墓志多记为阳城郭峪之中道庄，似乎有意与郭峪本村即郭峪镇相区别。但郭峪张慎言为同村之张鹏云所写的墓志铭中，却明确说其 / 上世自沁水金凤迁

居阳城之郭峪镇 0。⁴

据此，一般说自己是郭峪镇人者均为郭峪村民，郭峪里其他村的居民不在其内。这样，镇人中既有外来的移民，也有本地的土著；既有工商业者，也有官宦士绅，像镇人王重新，既是本地的土著，又是大商人；既世代居此，但他又在另外的龙庄（今史山村）立籍。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多 / 镇人 0 同时也是 / 里人 0。前面所引碑文中强调的是里人与镇中 / 托处者 0 之间的矛盾，也即在籍者和不在籍者之间的矛盾，而非里人与镇人的矛盾。

从前引碑文的字面上看，官府虽做出有利于 / 里人 0 的判决，但却担心在里甲操作下仍然会出现同样的弊病，使里人和商人受到伤害。根据碑文的前半部分，斗行的人还是力图恢复以前的做法，/ 里人 0 士绅因此立碑以维持原议，但显然，由里甲征收田赋同样是存在弊病的，只是由地方士绅控制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 / 镇富里贫 0 的主要原因并非由于镇人压榨了里人，而在于他们各自所从事的不同产业。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反映，并不一定说明里人与镇人的对立，否则也不会将碑立在郭峪村（镇）的大（社）庙里。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乾隆年间的两起纠纷中。一起纠纷是乾隆二十九年前后，本镇居民认为在本地开窑的卫、张两姓窑头因挖窑开矿伤害了本镇的风水，导致经济的衰落，呈请地方官封窑，得到批准。碑中提到受害者是 / 该镇居民 0，碑后题名的也是 / 阖镇士民 0，因此他们恰恰正是本地 / 镇人 0，他们的对立面是身份不明、但也居住在本镇的窑头。⁹ 另一起纠纷是乾隆二十年前后，因本镇土工行和轿夫行垄断本地婚丧嫁娶事务，强迫事主遇有此事必用他们高价承办，本镇士绅、乡地联合申告，希望地方官干预。这个纠纷中的受害者同样也是镇人，而非 / 里人 0。⁹ 这两例纠纷或许反映了镇中一般居民与特定行业者之间的纠纷，至多反映了土著镇人与外地务工人员的冲突，并不表明 / 里人 0 与 / 镇人 0 的矛盾。

在此前的康熙十三年，郭峪镇上的牙行立了一块石碑，碑文如下：

按阳城阖县额设商税银二百三十两，

顺治十二年四镇分认，在城分税银陆十两，润城分税银一百一十两，白巷分税银二十两，章训都郭峪镇分税银四十两。缘镇小非通往来客商者，有分到刘村、安阳、刘善、章训、南石、东石、南晋、北t、刘村、崇上、壁、东裴各里。卖物买t t t t 卖地t t t t 无t 立石，永远为志。

由于应纳商税被部分分派到各里，此项行为因此也被认为会引起里人的不满。但上述商税并非只与郭峪里有关，而是分布在全县的十二个里，如壁、东裴二里即原属在城，后被归并改易。或者说，郭峪镇所承担的商税份额，并没有部分转嫁到郭峪里民头上，而是摊到其它可能没有大镇的里，其它三镇的商税分摊也是同样，因此并不会引起郭峪镇人与郭峪里人的矛盾。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县城和三镇中的商户较为集中，商税主要由他们分担；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各里之民完全没有交易活动，因此由他们分担部分也不无道理。⁷

到康熙三十三年，郭峪牙行代表十七行的行户请求豁免除正额商税之外的其它各项杂派，得到官府的批准，因此立碑歌功颂德。通过碑文，我们知道，杂货、斗行、铁匠、银匠、酒行、屠行等等并非只存在于县城当中，只是因为路途遥远，应役困难，往往由在城工匠支应，在乡、镇各匠给予 / 帮贴⁰，因此此碑称为 5 县主衷老爷体恤里民行户永免一应杂派德政碑⁶。这说明，官府也并非只是关照里民，也注意体恤镇上的工商业者。据碑文称，此事之所以成功是由于陈廷敬的上疏，得到户部的同意，可见并非镇人的陈廷敬也并不一定是站在镇人的对立面的。

郭峪村的大庙或者社庙与泽州很多地方一样，是汤帝庙。清顺治九年的碑文称： / 郭谷镇大庙创于元之至正，修于明之正德，后灾于嘉靖，又修于万历，其补葺者亦时而而有之。^{0v} 由于缺乏材料，我们不清楚郭峪在元代是否已经成镇，但由于它在唐代便成聚落，五代后周时称 / 东邻郭社之陌，前据金谷之垠，既名额以未标，称郭谷而斯久⁰，可能彼时已有郭峪社。^k 元末修建汤帝庙时不知它是否已作为社庙，但明万历时重修则肯定是郭峪社的行为，

清顺治九年再修也是由社首王重新等一千人进行组织，郭峪的大族张氏也都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

从清初到清中叶，郭峪汤帝庙多有修葺，也大多是在社的组织内进行，从历次修葺所立碑刻题名来看，这个郭峪社似乎只限于郭峪村（镇），并不包括郭峪里其他村落的人。在顺治九年、十年碑中，社首均有王重新和张氏多人，康熙十三年修葺庙中高媒祠，也是 / 里人张肇基、张元弼等迫意为重修计⁰，基本上未见当时非常显赫的黄城陈氏。论者发现这一现象，并将其主要解释为陈氏是那种对乡村公共事务不太关心的士绅，其实忽视了陈氏并不属于郭峪社的范围。⁹ 另外碑中也有 / 镇之人每借 t 庙为公所⁰ 的字句，说明这个社庙确被当作郭峪镇的公共处事之所。

这种情况到咸丰间的碑刻中有了变化。在为重修汤帝庙捐款的题名中，包括了外地人或外地商号，远如山东峄县、河南周口，中如山西榆次、霍州、长治，近如阳城县城、大端、上庄等；还包括了一些个人在不同地方的募化，此外就是大批未注明地点的商号，应该就是在郭峪本镇的外地商号。与上述分列的是 / 本村捐贖⁰，既包括五永店这样的商号，也包括本地文人团体奎文社，以及一些个人，并无原来十分积极的郭峪社的痕迹。这说明，汤帝庙的背后除了郭峪镇的 / 老人⁰ 或土著之外，这时更多地出现了 / 新人⁰ 即外地商人的力量。⁹ 到这个时候，也许 / 镇人⁰ 才得到了重新定义，即从原来的郭峪村人变为以外地商人为主的移民，而郭峪本地人被重新定义为 / 村人⁰。

五、余论

在明清泽州的镇中，有许多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一些曾为过去的某级行政机构，一些从宋金时期就开始成镇，还有一些虽到明代成镇，但也是自唐代、甚至更早以来的聚落⁴。泽州地处万山之中，交通不便，镇的发展有此特点，应该说代表了华北地区的共性，与早期国家发展在特定区域的影响有关。

根据文章开始时所列表格，在以清代地方

志为主的材料中，泽州地区先后存在过至少42个镇，这个数量无法与苏州、松江和常州各府相比，但与太湖流域的嘉兴和湖州二府相差不多，也相当于苏州、松江16世纪初的水平。如以县为单位，则至少与桐乡、归安、乌程相同。[†] 考虑到一个是堪与19世纪以前的英国相比的发达地区，而另一个则是在华北腹地的山区，其自金、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常常为人诟病，这样一个非常表面化的比较还是令人惊讶。但是我们并不试图将这种状况与有关 / 都市化0 或 / 城市化0 进程的讨论联系起来。在所见关于泽州的基层聚落的材料中，发现自然村的地位还是最基本的。这里的镇基本上不是脱离原有的村落，在一个个新的所谓交通要道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原有的空间范围内被重新 / 冠名0 的。这里的镇并不像明清江南的市镇那样，具有由水栅、河道、桥梁和特色建筑构成某种边界，将 / 四乡0 与市镇区分开来，但是却可能在特定的时期加筑城垣寨墙，成为它们的一种标志性的景观，突出了它们作为 / 巨村0 或镇的地位。也就是说，与我们通常设想的那种从产生伊始就与乡村对立的城镇 (town) 不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村就是镇，镇民还是原来那些村民，无论他们是普通的农民还是士绅。因此这里的镇与其说叫 / 市镇0，不如说叫 / 村镇0，尽管这里往往也是乡村市场体系中的商品集散地。

这样一种特点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泽州的镇始终是 / 扎根乡土0，也即与原有的村落共同体保持密切联系，并未因成镇或称镇之后便与本村脱离干系，独立发展；同时，这些镇的形成往往具有悠久的聚落历史，因此即使是历代基层制度的设立地点，也要考虑这些 / 巨村0，如元代的管和明代的里，后者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 / 巨村0 的地位。

与此相应的是，这些 / 巨村0 中的居民也同样具有长期的延续性，也就是说一些大族长期在本村或本镇居住，至少是本村或本镇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而较少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变动。比如前面提到的沁水郭壁的韩氏和苏氏，另外如晋城冶底的董氏，从元初到清后期一直是修建东岳庙的主要力量，这也许是维系其 / 巨村0 或镇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些本地人

或继续从事农业，或经商积蓄财富，或在明清之际进入仕途而获得权力资源，既保证了自己在本地的长期控制力，又维系了村镇之间的稳定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社自金、元以至明、清，具体的含义有所变化，无论这期间历代朝廷的基层户籍管理、赋役征派、治安与教化组织如何不同，社的组织却始终存在，甚至一直延伸到民国时期。一方面，一些大族从元、明以来一直把持着社首的位置，另一方面，无论从村到镇，还是由镇复归为村，甚至在晚清以后一些镇上的外地人增加、多姓参与公共生活的情况明显之时，社的核心位置依然未变，成为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力图控制的所在，也是他们发出声音的公共场域。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全国其它地区，明代里甲制度的实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或者对于地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较大影响，而在明清泽州地区的民间文献中却往往语焉不详的原因所在：因为像里甲制度这样的制度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外来的、自上而下强行贯彻的、甚至是临时性的制度，而社却是本土的、与本地人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惯习密切相关的、长期性的制度，既是地方认同的标志，也是地方权力体制。

在一定意义上，以上的分析与科大卫的看法一致。在5韦伯不知处：明清中国的市镇与经济发展6一文中，科大卫分析了江南的濮院、南浔和乌青镇的情况，这些市镇与苏州或南京等大城市不同，经常由自元代发展而来的一个或几个大族支配，直到16世纪他们的权威才受到外来移民、比如以前的仆人或商人的挑战，这就促使他们去建构一种历史的合法性。这些大族士绅否认市镇的商业特性，而强调市镇与其乡村渊源的联系。科大卫认为，城市或市镇的居民看待自身世界的方式与乡民并无不同。 / 不仅乡民，城市与市镇居民也是从乡村的视点去看待市镇和城市的0。[‡] 他在文章中强调了建立在明初里甲制度基础上的市镇领导权到16世纪转归获取功名的士绅之手，而在这一过程中 / 宗族的兴起0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市镇中则表现为对寺庙控制的争夺。[§] 他认为，这些都与乡村中发生的过程是一致

的。

虽然泽州的镇与普通村落的区别在于这里的工商业集聚程度，特别到清后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使镇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但正如前述，镇与村的地缘一致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里与其说形成了 / 市场共同体0 (marketing community)，不如说依然保持着 / 地缘共同体0 (territorial community)，而维系这个地缘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资源就是社。正如科大卫所说， / 在人们被组织到里甲中去进行祭祀之前很久，社就是地缘共同体的中心，这在广东、福建、长江下游都有体现0。⁸但在泽州，元代的社制和明代的里甲制度都没有改变社的中心地位，这里的村或自然村是最基本的聚落形式，社就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的，一村一社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没有因为明代因里建社，也没有因为明清之际里甲废弛而完全改变这种基本的格局，甚至，由于本地的里甲往往依村社而设，所以能够延续到清末。

这种地缘共同体的维系的重要因素就是历史的悠久。在华南，我们很难寻找到延续几百年甚至一千多年的村落，我们也很难找到与这些古老的村落有直接联系的大事件、大人物，比如长平之战、孔子、唐玄宗、程颢等等。在这里，炎、黄、女娲、尧、舜、禹、汤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圣王成为百姓生活中有 / 迹0 可寻的重要文化资源，他们不像华南地区外来的移民所塑造的神，也不像国家礼制塑造的正祀，而是一种本土的、与村落生活息息相关的神圣象征。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居民变动性在某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相对较弱。对于一个 / 洪洞大槐树移民0 传说脍炙人口的地方，对于一个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地方，这个说法似乎是无根之谈，我们也确实看到过不同历史时期一些村落的姓氏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例子。但是在元代以后到清末民初之前，我们毕竟很难看到这里大规模居民变动的统计，相反我们却看到一些历经元、明、清长期存在的大族，平安度过了明末清初的动乱，现存的族谱显示的也多是从明代至今尚存的状况。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无论从唐代以来的大批墓志还是从地方志或族谱的记录来看，其始迁祖来自的地方都相隔不远（比如阳城的一些家族自称来自高平

的赤土坡，即金门镇），这里早已不是吸引大批人口前来开发的地区。即使有因经商等原因出现个别性的人口流动，但并不造成其举族而迁、导致其聚落 / 换血0 的局面。这种地缘共同体的维系也有赖于在历史过程中本地人的自身努力，这种努力反过来也成为地缘共同体的后果。在金元之际的本地士绅如李俊民的笔下，蒙古灭金的 / 贞 之变0 常常被描述为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但同时他也大量记录了乱后寺庙的迅速重修，成为地方社会秩序重建的表现。

在泽州，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珠江三角洲 / 宗族的兴起0 那样的、在镇的勃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变化。一些镇兴起于宋、金，更多的地方也是到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称镇，这与明初里甲制抬高了设里之村地位有关，与本地人开始取得功名、进入仕途有关，与本地区商业的发展有关，也与明末清初战乱的压力迫使其自保有关，但这些都只能说明上述因素使一些村有别于另一些村，因此前者被称为镇，而不能造成结构性的变化，使前者走上一条与后者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多数地方的镇与原来作为村落体系中心的村差别不大，除了一些镇早晚不一地有一些外地人进入外，村人就是镇人，在自称与他称方面，村人与镇人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社始终是这个地缘共同体的中心，村社就是镇社，镇与其它村之间的联系往往也是通过社的网络。这些镇与周围其它未被称镇的村落之间，与其说是一种反差很大的城乡关系，不如说还是一种村落关系，只是有中心村与一般村那样的不同。

那么，镇人在这样自称或被称的时候，有没有与以前被称为村人时的相异之处？有没有与周边各村的那些此时还被称为村人者的相异之处？如果没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有别于从前或他人的称呼？如果这种称呼体现了某种身份认同或某种新的地缘共同体意识，那会表明什么？

在以往关于乡村关系的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中，已论及村落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关系，这种紧张和竞争可以通过水利纠纷、土客矛盾、宗族械斗、迎神赛会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相互的协调，形成

村落之间权力关系的某种差序格局，而称镇或成镇之村应该在这样一种差序格局中占有优势的地位。因此，在前面引述的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对本镇的自豪感。也正因此，在镇人与同样的镇人自称 / 镇人0 或 / 村人0 时，随意性是很大的；在某些地方、涉及某些问题，或在某类材料中，可能会更突出这个镇的身份，而在另外的地方、材料或问题上，又可能完全不在意这个身份。

按照前面的材料，阳城白巷也是被称为镇的，而且在阳城的所谓 / 四大镇，八小镇0 中属于 / 四大镇0 之一。⁵ 但我们在当地的材料中很少看到它称镇的说法，与郭峪等地形成鲜明对比。这里在明代为白巷里，至民国人们也还习惯称为白巷里。它由上、中、下三庄组成，所以地方文献中往往又称其为三庄。如 / 源出史山曰史山水，会郭谷、三庄诸水，西流至润城镇入沁河中0，⁶ 可见在当地的正式说法中，有的地方要称镇而有的地方则不必称。这里在元、明时矿冶就十分发达，⁷ 也出过一些名宦大族，如上庄王氏，下庄李氏、杨氏，都在明末清初以进士发迹，但却没有经常以镇自诩。在清雍正十三年的一块墙碑中，讲到保全以前修建的堡寨，因为这些公产 / 半属于村民或典或卖者0，请求官府 / 出示永禁，则合村人民辈辈感恩，世世戴德矣0，官府的批示也是： / 为此示，仰该村乡地 t 甲人等知悉，，0；⁸ 嘉庆元年白巷里的一块碑文中，经常出现的是 / 合里绅耆0、/ 闾里人民0、/ 闾里同立0 字样；⁹ 另有一嘉庆二十一年碑称， / 如吾村馆庙之兴筑，固众人所共愿者也0；¹⁰ 等等，在族谱、私人书信中也绝少称镇。在白巷，人们的认同是明代以来的白巷里或相应的三庄或三社，而不是镇的概念。

在郭峪的许多碑文中都非常强调其镇的身

份，但在明代的碑文中称镇时不多，往往是表现一种自豪感的用词。如 / 吾乡郭谷，夙称巨镇0，具体说到本地人时还是 / 乡人0；¹¹ 又如 / 吾镇迩来蜚英跻跻，文运益昌0，但说到具体的地点时则是 / 第村之北，，0，¹² 因此镇和村在所指上是有分别的。王重新自己撰写的 5 焕字变中自记¹³ 是一篇记事的文字，与那些公之于众的 / 展示性0 碑文有所区别，他在文中只在提到张鹏云时用了 / 本镇乡宦0，其它各处均用 / 吾村0、/ 合村0 等，到清代的碑文中镇的使用才变得普遍起来，说明郭峪镇的认同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总体来说，碑刻都具有权威性、神圣性、展示性的特点，其中的文字措辞虽能表现出地方历史及其变化，但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观念与实践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在明清时期的泽州，镇的共性可以概括为 / 巨村为镇0，即村镇统一体；其不同大体在于以下三类：一是像高平的米山、晋城的周村这样自宋金以来即称镇的地方，由于其历史悠久和交通等条件的优越性一直不曾丧失，镇的叫法和认同比较稳定；二是像阳城的润城、晋城的高都，甚至郭峪这样的地方，虽然也是在明代后期才开始称镇，但由于内部的努力，造成了它们的内部城市化趋势，比如修建城垣、划分坊巷、根据风水和礼制在相应的位置安排神圣空间（修建庙宇）、外来移民构成镇中人口的较大比例等（第一类也可能具有第二类的特征）；三是当时被称为镇，但基本上还是村落的形态，也被普遍视为村的地方，如阳城的白巷、沁水的郭壁、晋城的冶底，是典型的 / 巨村为镇0 的代表。虽然这些镇的兴起和存在程度不等地具有工商业发展的因素（第二类镇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显然还是与它们所在的和其它的村 / 同呼吸，共命运0，一起走进 20 世纪的。

x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 2006 年重大项目 510 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⁶ 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6JJD840018。

¹ 对于明清市镇研究的学术综述，可参见吴滔：5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6，5 中国农史6 2005 年第 2 期，其中涉及到的相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此外对于近期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的综述，可参见郭常英：5 / 市镇研究0 大有可为))) / 中国江南市

镇国际学术研讨会0 综述6，5 史学月刊6 2004 年第 5 期。从以上二文也可看出，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仍是市镇研究的热点。

² 参见前揭吴滔文。

³ 参见：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Palgrave Publishers, 2002. 本书是 1996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的结果。笔者曾经与会并发表论文，本文

可以视为对会议提出的问题的后续思考。

¼ 相关成果如晋商研究不胜枚举外，尚可参见行龙的5走向田野与社会6（三联书店2007年）及笔者的5小历史与大历史6（三联书店2006年），当然还包括上述二书中提到的相关研究。

½ 杜正贞：5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6）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笔者与杜正贞一起数次前往该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文献，以该地区为我们的华北区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因而本文的看法既可反映我们共同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有对她的著作的补充。

¾ 雍正5泽州府志6卷6，/山川0，第1页上。

¿ 雍正5泽州府志6卷1，/星占0，第11页下。

À 明万历时的泽州知州傅淑训曾在5泽州志#序6中感叹：/往闻愚公之移太行也，意为直一部娄耳。及揽辔来陟太行之巅，遐哉齐青未了也。盖尼父于斯旋轸焉。史称尼父临河而叹：某之不济，命也。夫此非太行回轍之言也。0同上书，/旧序0，第4页下。作者时过境迁，不完全理解这些传说的意义，但也发现了这些传说的共性。关于孔子到此掉头而返的传说，在当地留有遗迹，表明的就是文化的边界问题（/[孔子回车辙迹] 邑南四十里，天井关石路车辙迹，回环约百余步，深数寸许。传孔子将适晋，闻赵简子杀贤人鸣犊舜华，至此回车，后人因之立庙。0同上书卷13，/古迹0，第1页下）。愚公移山的故事，实际上也可以被理解为试图突破文化传播之地理障碍的努力。

Á 乾隆5凤台县志6卷3，/仓廩0，第4页上、下）第5页上。

Â 同上书卷3，/学校0，第7页下）第8页上。

Ã 同上书卷3，/关隘0，第11页下。

Ä 同上书卷12，/古迹0，第11页下。

Å 同上书卷1，/沿革0，第8页上。

Ä 徘徊应与今三甲镇不远，清前期曾有徘徊西里，下辖三村，其中就包括三甲村。

Æ 乾隆5高平县志6卷4，/驿墩铺递0，第9页下）第10页上。其中唐安镇距马村镇极近。

Ç 同治5高平县志6卷1，/地理0，第39页下。

È 光绪5续高平县志6卷3，/古迹0，第12页上。

É 乾隆5高平县志6卷3，/沿革0，第8页下。

Ê 乾隆5高平县志6卷4，/驿墩铺递0，第9页下）第10页上；同治5高平县志6卷2，/建置0，第17页下）第18页上。

Ë 雍正5泽州府志6卷13，/古迹0，第17页下。

Ì 光绪5沁水县志6卷2，/方輿#古迹0，第12页上。

Í 同治5阳城县志6卷5，/赋役#里甲0，第5页下。

Î 雍正5泽州府志6卷23，/里甲0，第1页上。

Ï 乾隆5凤台县志6卷3，/里甲0，第20页下。

Ï 在一个方圆几里的范围内，高都东、中里与水东里东西相对，府城里与高都北里南北相对。当然我并不知道东山四社是否就勾画了这个范围。

Ð 碑在冶底村东岳庙。

Ñ 5元典章6卷23，5劝农立社事理6。

Ò 正德七年5重修东岳庙记6，碑在晋城东岳庙。

Ó 顺治十八年5重修东岳天齐庙记6，碑在晋城东岳庙。

Ô 乾隆五十三年5东岳庙装修东庭记6，碑在晋城东岳庙。

Õ 大定二年5重修大粮山定林寺碑阴6，碑在米山定林寺。

Ö 关于米山镇身份的强化，将在下文进一步论证。

× 正德5米山镇新修垣墙记6，5高平金石志6，第357页，中华书局2004年。

ÿ 乾隆八年5紫峰山永禁樵牧碑记6，碑在紫峰山碧霞宫。

à 万历八年5山西泽州高平县东乡石末镇乡约碑记6，碑在石末村宣圣庙。

á 康熙十七年5邑侯大梁都老爷利民惠政碑6，王小圣、卢家俭编：5古村郭峪碑文集6第159页，中华书局2005年。

â 嘉靖5明故南平处士张君墓碣铭6，同上书第191页。

ã 万历5重修汤帝庙舞楼记6，同上书第65页。

ä 康熙5郭峪镇仕宦题石记6，同上书第142页。

å 顺治5阳城额设商税银碑6，同上书第155页。

æ 冯俊杰：5山西戏曲碑刻辑考6，第265）267页，中华书局2002年。

æ 道光5补修大庙记6，碑在郭壁村崔府君庙。

ç 隆庆5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6，碑在周村镇东岳庙。

ç 光绪5阳邑大社六义堂记6，张正明、科大卫编：5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6，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ø 关于文中所引明清太谷净信寺的碑刻资料，皆见史若民、牛白琳：5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0）480页。

ø 虽然杜正贞的著作对市镇中的社已有专章讨论，但仍值得继续思考。

þ 康熙二十三年5定林寺创修东阁记6，碑在定林寺。

ð 康熙十一年5高平县正堂白为永禁凿窑保全龙脉事6，碑在定林寺。

é 正统四年5定林寺彩画七佛殿壁记6，碑在定林寺。

þ 万历二十年5大明泽州高平县定林寺积善记6，碑

在定林寺。

p 乾隆元年 5 定林寺种松碑记6, 碑在定林寺。

p 同治 5 阳城县志6 卷 5, / 赋役# 里甲0, 第 5 页下。

p 这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 如果我们用今天具有行政级别意义的 / 镇0 去理解过去的镇与村的关系, 就会有所误解。

p 东岳庙正殿左侧壁上镶一墙碑, 正中大书 / 本镇张世德施银一百两0, 两边分列其子、侄、孙、曾孙的姓名。论者认为前碑强调张世德为 / 寄居0, 这里则强调他是 / 本镇0, 表明张氏一族力图通过捐钱来换取一种本地的身份。见杜正贞前引书第 149 页。但需要证明的是, 前碑是润城社所立, 而此碑是张家自己所立。因此也可能具有另外一层意思, 即强调 / 镇民0 张家与 / 村民0 的区别。

p 乾隆 5 润城社新制神伞仪仗记6。

p 康熙五十二年 5 重修大殿碑记6, 碑在下交汤王庙。

p 康熙十七年 5 邑侯大梁都老爷利民惠政碑6, 王小圣、卢家俭编: 5 古村郭峪碑文集6 第 159 页, 中华书局 2005 年。已可参考郭峪汤帝庙原碑。

p 这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说斗行只是收购粮食, 花户从卖粮所得之钱中拿出田赋, 通过里甲的渠道交纳给政府, 那么就谈不上再把收购粮食之权交回里甲来办钱粮的问题。

p / 花户0 即纳税人户, / 帮贴0 往往指因他人帮自己承担了某项义务而给该人的一些报酬。

q 陈廷敬: 5 午亭文编6 卷 40, 5 义冢碑记6, 第 11 页下) 12 页上。

q 张鹏云: 5 郭谷修城碑记6 (明崇祯十一年), 碑在郭峪城中。

q 崇祯十一年 5 抄录奉旨叙劳疏6, 碑在郭峪城中。

q 顺治十二年 5 城窑公约6, 碑在郭峪城中。

q 乾隆 5 创修奎星阁碑记6, 碑在郭峪城中。

q 咸丰五年 5 重修奎阁城垣河堤碑6, 碑在郭峪城中。

q 陈廷敬: 5 故北直隶任县知县卢府君墓表6, 5 晋城金石志6 第 699 页, 海潮出版社 1995 年。

q 崇祯十三年 5 焕宇变中自记6, 碑在郭峪豫楼。

q 5 清故大中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雨苍张公墓志铭6, 王小圣、卢家俭编: 5 古村郭峪碑文集6 第 220 页, 中华书局 2005 年。

q 乾隆二十九年 5 封窑碑记6, 碑在郭峪村委大院。

n 乾隆二十年 5 邑侯杨老爷剔弊安民示6, 碑在郭峪汤帝庙。

v 碑文中的商税包含哪些部分并不清楚, 但根据后面残缺的字句可知, 应该包括买卖土地和其它物品的交易税。根据乾隆时期的地方志记载, 属于商税范围的

包括溢额商税、畜税、牙帖税、盐牙税、当税、房田契税等 (卷 4, / 田赋# 税课0, 第 5 页上), 因此不能说里民完全不涉及这些交易行为。

w 顺治九年 5 郭谷镇重建大庙记6, 碑在郭峪汤帝庙。

x 徐纶: 5 阳城龙泉禅院记6, 5 高平金石志6, 第 353 页, 中华书局 2004 年。

y 参见杜正贞前引书, 第 142) 143 页。我们知道, 陈氏家族在将郭峪原来的里馆改造为文庙的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事不仅是陈廷敬倡议, 而且还捐地捐款, 这是因为他将此视为涉及本地区全体士绅、甚至本地文运的事情。因此 5 里馆故墟建孔子庙碑6 碑阴中列出本地自明成化到清康熙的 93 名有功名者, 既包括张氏, 也包括陈氏, 就连与文庙有关的文社组织, 也是陈氏把持的。见 5 文社财产及保护碑6 (此名为今人定), 碑均在郭峪文庙。

z 咸丰 5 重修汤帝庙舞楼碑记6, 碑在郭峪汤帝庙。

z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存在, 如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等。

z 参见刘翠溶: 5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都市化之发展与人口特征6, 梁庚尧、刘淑芬主编: 5 城市与乡村6, 第 251) 252 页, 表二和表三。

z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eds.,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 Introduction0, Palgrave Publishers, 2002, p. 5.

z David Faure, / What Weber Did Not Know: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China0, idem, pp. 64, 75.

z Idem, p. 77. 这一点在杜正贞前引书的结论中也得到了讨论, 第 282) 283 页。

y 民国 5 阳城乡土志6, / 地理0, 第 28 页上。/ 区分为七十八里, 统属于十有一都。四大镇, 八小镇, 周围约五百村庄0。但具体是哪些被列入四大镇和八小镇中却不得而知。

w 同上书第 30 页下。

x 同上书第 4 页下。/ 明正德七年, 霸州贼刘六、刘七至阳城东白巷里等村, 村多业冶, 乃以大铁锅塞衢巷, 登屋用瓦击之0。

y 雍正 5 王公保全磐石寨城垣窑楼永禁拆毁碑6。在阳城县中庄汤帝庙。

x 碑无题, 在阳城县中庄汤帝庙。

z 嘉庆 5 重修东西客房看楼钟鼓楼山门门外市房并补葺一切碑记6, 碑在阳城中庄汤帝庙。

z 崇祯十一年 5 郭谷修城碑记6, 碑在阳城郭峪村。

z 万历四十六年 5 郭谷镇修券造像碑6, 碑在阳城郭峪村。